非常教师

项恩炜 人称“大象”，浙江海宁人，与金庸同村。

20世纪80年代初生人，2004-2014年，在上海卢湾高级中学做语文教师。现为独立教师，发起“成为学习者”工作室，专职从事“学法研究”。

项恩炜：成为学习者

□本报记者 马朝宏

2004年，项恩炜大学毕业，来自农村的他，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上海市选苗育苗工程百名优秀大学生，顺利进入政府部门，捧起了人人羡慕的“金饭碗”。

然而，才工作了一个多月，他就辞职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见到一名老百姓。难道公务员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的工作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更重要的是，项恩炜一直的愿望是做一个教师。高考时，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志愿报考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摆明了非要做个教师不可。

辞职当天，项恩炜从单位宿舍出来，提着大包小包，漫无目的地坐上了一辆公交车。恰好路过卢湾高级中学，被卢湾高中美丽的校园所吸引。“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做个老师，应该挺好的吧。”他想。于是，跳下车就去应聘了。

那时，学校已经过了招聘季，但接待他的老校长李昌群看着眼前这个真诚、独特的年轻人，手里的一摞荣誉证书足以证明他的优秀，便破格把他留了下来。大概李昌群校长那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多了一个杰出的教师。

观察、记录，走进学生的生活

初登讲台，项恩炜遇到的第一篇课文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关于这篇课文怎么上，可以参考的内容特别多，名师开课的资料也很多。但大家对于这篇文章教什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项恩炜有些糊涂了：这篇文章到底教什么？高一的学生到底该学什么？他在教案上写下“教学目标”四个字，后面什么也没写出来。

最后，项恩炜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把自己想到的可以成为教学目标的全部写成教案。于是，便出现了教结构，教议论文，教复句，教悼词格式……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项恩炜虽然按照师父的点拨上完了课，但是“教学目标如何确定”这个问题，他还是没有弄通。于是，他开始疯狂地查找资料。后来，他看到教师王荣生在《语文学习》上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要先把选文分类，才好确定课文的教学目标。于是，他按照王荣生的分类，一口气又写了3个教案。

就这样，项恩炜带着他特有的执着与认真，开始了教师职业生涯。

只要有时间就听课，师父的课项恩炜基本上一节不落的都听了。不只是听语文课，拿个板凳满校园听课，一年听课就将近1000节。

不只是听，项恩炜还做记录，记教师的课堂行为，记学生的课堂状态、反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后来，项恩炜担任班主任，像记录课堂一样，记录着自己和班级一起成长的故事，而且尽量记录每一个细节。每年教师节的时候，他会将文字进行简单编辑、装订成册，当作礼物分发给恩师、同行。10年间，他任过6个班的班主任，每个班都有独立的博客。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记录？项恩炜说，想知道自己干了点什么，日积月累，勾勒出一个普通教师的命运图景；也觉得这应该能为研究教育的人提供一些材料和数据。项恩炜那时候根本没料到，自己后来会走上“学法研究”之路。

记录的过程也是项恩炜走进学生生活的过程。当真走进去时，他发现了一个充满无限生机、不可预测的世界。项恩炜动情地为班级的每个学生用文字画像。“上课时，他常常跷着腿，自言自语，东张西望，但是只要你和他四目对视，他就会知趣地做个道歉的姿势，开始乖一会儿。记得有一次造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在弄清原意后，我要求大家造句。结果，在所有四平八稳的句子中，王巍之的句子让大家记忆犹新：X和Y在果园里打架，X抓了一个桃子当手榴弹投向Y，Y马上也报复着扔了一个李子回击……”

在画像的过程中，项恩炜发现，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可爱，原来每个学生的内心世界都是那么丰富。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学生，项恩炜主动接受心理咨询方面的培训。2005年至2006年，他自费参加了高级心理保健师培训；2006年至2007年，自费参加了NLP教练技术培训。慢慢地，项恩炜发现个案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于是，他的观察和记录越来越倾向于学生个案。另一方面，观察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多。随着工作的深入，出于专业交流的需求，项恩炜的记录也开始聚焦问题，比如，“课堂的节奏”、“座位的排法”、“迟到的处理”、“组心的干预”、“为什么手插口袋的学生会学得很好”，等等。

“我无法为学生负责”

转折，发生在2007年。

年初，班级学生“2007”（编者加）因为厌学，面临着中途退学的困境。作为班主任，项恩炜希望能够帮助他。于是，他们同吃、同住、同行40天。这个过程，项恩炜第一次完整地采用了实录形式：每天做了什么事，关键环节说了什么话，他的日记，他家人的记录……

当项恩炜跟学生同吃、同住时，他第一次发现学生世界的浩瀚——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作为他的老师我连他每天饭量多少、需要多少睡眠都搞不清楚，连他的数学基础在哪里都搞不清楚，连他到底认同自我的什么身份都搞不清楚。”项恩炜说，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再走进教室面对学生时，“我觉得我是在犯罪。”

现实中，总会面临个别学生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每天我要求大家不能提高？”“为什么他的英文单词记得比我快？”“为什么我上课很用功，却效率低？”“为什么我努力学数学，却还是不及格？”等等。每当这时，项恩炜都觉得惭愧，因为他不知道答案，不能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他总觉得类似的问题应该能用科学来解释。

于是，项恩炜耗尽半年薪水继续自费学习NLP教练技术，同时开始了对学生更为微观而有趣的记录：从学生的作文语言习惯看当事人的思维特点，再判断其幼年曾经接受的训练；从学生的站姿甚至眼球转动的方向看当事人的脑海活动，再请当事人给予印证……

项恩炜总是说：“我无法为学生负责。”他这样说，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相信，只有发展自我，才能获得自由；只有自主，才能真正地发展。于是，2011年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项恩炜带领学校的“创新班”，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寻找一种帮助学生建立自我的途径，让学生在经由“自由——自觉——自主”的过程中，循环上升式地建设自我。

新班初成，项恩炜让学生们申领任务，有的管卫生，有的管纪律，有的带领大家学习，让学生体验到良好管理状态下的班级舒适感。这种没有规则的时间持续了大约两三周后，感觉到“自由”的学生有的觉得好，有的觉得不好，当学生们体验到“没有规则不行”时，班规已经呼之欲出，辩论一番后，必需的规则水到渠成……项恩炜的这种做法契合了自由和规则形成的规律。

“我们第一次体会到自主的重要性，座位安排、教室布置、工作分配等都由我们自己完成；第一次知道评语并非只产生于老师的笔下，我们互相当评委，在评价中欣赏他人、悦纳自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项目，但背后离不开的是每个同学的支持与帮助；我们25个人，本是独立的个体，但在相处的两年中，渐渐成为一个集体，每个同学的特长、才能都得到充分地发挥，收获也颇丰。”学生们在总结中写道。

这个创新班的探索获得了成功。项恩炜观察和记录的对象也渐渐从本校学生扩大到整个上海市的范围，再扩大到全国各地……研究个案积累达到了数百个。

让学生更易发生“真学习”

数百个学生学习个案记录与研究，无数次与学生一对一地交流，让项恩炜对于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有了清醒的体悟。他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了解与影响的。教师只有学会学法，只有放低身段，真诚地面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盲区，才能够帮助学生。教师也只有将自己变成一个学习者，才能够带领学生一起学习，才能够明白在学习的路上，学生遇到了什么，需要什么。

记者手记

“未完成的象”

许多人印象中的项恩炜是极其温和的，温和的表情，温和的语气，温和的声音，温和的眼神……但是，一旦他进入慷慨激昂的表达状态，他的头发和嘴唇，乃至腮帮子都在颤抖，他也会拍桌子，瞪眼睛，着急的时候甚至骂人。

上课也好，与人交流也好，项恩炜都非常注重倾听，注重别人的感受。但是，一旦他进入工作状态、思考状态，外人外物就像不存在一样。

有人说项恩炜很“轴”，这个评价一点儿都不冤枉他。2009年，他担任“梦翔8班”的班主任，本来做得风生水起，整个班级各项表现都很突出。但是有一天，他听说有的学生为了参加班级活动而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忽然意识到，“班级凝聚力越强，对学生的个人自由侵犯越多，而我追求的是民主和个人自由，这不是悖论么？”于是，项恩炜觉得自己的行为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便辞职不做班主任了。直到有一天自己想通了，才又重新带领“创新班”。

你说他认真也好，你认为他“轴”也罢，如果没有这种对真理如此执着的追求，也许今天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项恩炜的这些看似“怪异”的做法背后，是他对学生、对生命、对教育、对学习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他的搭档王宏说：“大象是开拓新世界的人。”

“成为学习者”是基于项恩炜对“人”的理解而产生的。他相信“人”的生命充满不确定性，永远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同时又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

“成为”，中文有“未完成，正在行进中”的意思；对应英文是“being”，恰恰不仅有“正在进行”之意，更有“生命”“存在”之意。

“学习”，是人之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人之存在的尊严，除了存在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学习。而英语learner，也区别于study，少了一份对于技能本身的强调（动物也可以学习技能），多了一份直指学习内涵的理解。

成为学习者，是指做一个接受自己不完美、未完成、充满不确定的状态，但依旧能够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来发展自己、逐渐成人的人。

因此，他叫“未完成的象”。

学生笔下的项恩炜

每周推荐

□俞子夷

小学教员该注重理论，还是经验？

随看随想

与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们一样，俞子夷先生（1886-1970）也是“民国教育家”。他研究和实践的领域，主要是小学教育。文章原载1922年10月《新教育》第5卷第4期。

理论和经验，孰轻孰重？就小学教师的工作，作者试图做些论析和回答。其实，凡事，我们在躬身践行时，都需要求诸一己之外（前人的思想遗产，还是他山之石？），这不限于教育工作，也不限于某一时代。（任余）

曾记得十几年前新式学校教育才起头的时候，有一辈日本留学的人执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所的教鞭，讲种种教育上的理论。当时的小学教员对于这种种理论大都以为是理论罢了；以为实地上课是小学教员独得的经验，讲理论的未必能自己实地上课，有实地上课经验的小学教员用不着什么理论。所以理论和经验成为对立的两派。当时经验派在某几点确乎有理论派不能及的成绩，就是拿实际上课论，经验派确乎能措置得从容不促，学生安安静静地受教。这现象是不是可以证实理论不及经验？

从元年以来师范学校渐渐加多，师范毕业生也一天多似一天。并且师范生除学习种种教育上的理论以外，还要有半年或一年的实习。各师范对于附属小学校的组织和教授等等也十分热心研究改进，所以附属小学校的精神至今还能做一地方小学校的领袖。师范生受了这种训练，毕业后出去办事，成绩当然比从前要格外好些，实际也的确比从前好得多。但是大多数师范毕业生办的学校处处把附属小学校当作标准；无论组织，设备，就是教授方法也大多模仿附属小学校的。倘使问起他们师范里学的理论和附属小学校里实习得到的经验哪一种有用，差不多异口同声，多说：“我们此刻办事全靠附小实习所得，讲堂理论始终没有应用过呢！”师范学校既经把实地经验和理论并重，并且竭力想法把经验和理论联络，然结果还是经验胜。这可以证实理论不及经验吗？

……

二三年来实验教育的风气也很盛。试验的，自然要算设计教法的问题顶重大，顶有兴味，推行的地方也顶广，试验的态度和精神也比较的顶好。然而大多数的试验不外乎模仿方式和手续；大多数的研究也不外乎“怎样怎样办”。很少有小学校教员提出关于设计教法方面“何以？”“为什么？”“有什么根据？”等问题。杂志里顶受欢迎的是实施报告，演讲时顶注重的是“怎样办法”，参观人顶要问的是“什么什么”的方法。曾经有位参观人要求我谈话。我每说一实际事实必略带些理论的根据。这也不过是一种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不料他听得很不耐烦，说：“先生；请你不说理论——理论我多在书上看见了，专谈经验。”这一位参观人或者是聪明过度的人，所以他只要利用我的经验；至于理论，他胸中自有成竹呢。但是大多数不如此聪明过度的人也顶注重在这经验上。难道这完全从新理论上发生的新方法，一传到我们重经验的民族里来，也要抛掉理论上的根据，专在经验上用功夫吗？

何以理论被人轻视？这不是理论本身的不好，实在是理论传布法的不好。我们讲理论的人对于理论往往视为天经地义，不当它是科学上一种假定的结论。所以讲述理论的时候用顶简捷的注入法，并且常要带着“应该”“必定”“当然”等决定的口气。一方面惯受注入讲演的人，失掉科学的研究态度，缺少适应的能力。他们听了理论起先未尝不崇拜到五体投地——听名人演讲像杜威演讲的尤其如此；不过因在学校学习时没有培养好实地适应的能力，所以一到实地教授，就不会把理论实地应用了，所以就看不起理论了，所以爱别人告诉他现成的方法了。倘使学校里讲理论时用了正当的研究方法，师范生养成了科学研究的习惯和态度，那末决不会有这种轻视理论的现象，理论和经验自然互相有联络了。这一方面的改良全在乎我们讲理论的人自己的态度。所以无论小学，中学，大学，科学研究法是比别的教材格外重要。

究竟理论和经验的真正关系是什么？理论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的。从科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结果是可靠的，凭空臆造的议论是不可靠的。我们此刻所说的理论，当然拿可靠的做标准，其实就是经验经过科学的组织成功的结晶。但凭经验未尝不可做一个好教员，并且学得理论的人也要实地应用成功了自己的经验才可以成好教员。所以经验并不是不必要的，实在是很重要的。但是经验没有理论去指导，往往要走迂远的路，或者走入不正当的路。走迂远的路是空耗时间和精神；走入不正当的路要生产不好的结果。理论决不能代替经验；然而理论却可以做经验的指导。最好要把学的理论和自己的经验化成一起。

但重经验的人往往缺少伸缩性，往往喜欢呆板划一。有了理论做指导，可以免去这弊病。要知道教育学生的原理没有几多条，实地运用的方法千变万化没有底止。只重经验的人要留心许多的方法，因此成功呆板划一的习惯。一成功呆板划一，于小学教育就顶不相宜。朗读多于默读，写字描红——等教法上的改革比一千九百十一年的政治革命，剪辫子还要难得多呢。若是有了理论的指导，早就可以绝迹的了。小学教员该注重理论，还是注重经验？这一问题读者可以自己解答，我也不用注入的方式来侵犯读者自由思考的机会。

（选自《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

师生之间

□李 娜

班级“小神通”

“金铭同学接你的话了吗？”我刚调入新学校的第一节课后，搭班的同事就迫不及待地问我。

“没有呀！”同事见我愣在那里，赶紧说：“就是陆金铭呀！外号‘小灵通’。”

这下我想起来了。课上，我正要自我介绍时，有个男生抢了我的话。“老师，我帮你来介绍吧……”咦，他来替我做介绍？真稀奇。于是，我认真听完他的介绍后，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是‘小灵通’呀！”其他学生抢着回答了我。

从同事的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小灵通”的评价不高。“上课时他从来不等老师说完，就接着老师的话说下去，你一定要给他个下马威！”

再次上课，果然如同事所说——不等我说完，他就接着我的话说下去了。奇怪的是，其他学生竟然听得认真。

课下，我找到他，与他约定：以后他讲我听，不对的地方，我来纠正，条件是保证班级成绩在全校得到第一，否则他就绝对不可以再接老师的话。起初，我想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紧接着，他选择了班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作为小组长，由他们督促各小组成员按时完成学习任务。而他，除了向我借参考书外，还忙着上网查阅资料、与小组长商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来请教我。

我发现，他总是一点就透。而经过他“消化”又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起来的课，其他学生更容易听懂。此时，我开始从内心里佩服起这位“小灵通”来。

在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真的位列全校第一名，而他的成绩是满分。取得这样的成绩，同事们在向我祝贺的同时也向我讨教高招，我说多半都是“小灵通”的功劳，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再后来，他组织了讲课小组，自己担任组长。讲课小组共同讨论，课堂上由几个小组成员轮流讲，而他与我一样——坐在下面听讲。接着，我又交给他班长的职务。同样，他成立了新的班委会，对于班级管理的问题，他们共同出谋划策，最后向我汇报，等我决策，这下我变得更轻松了。班级各方面的测评都排在学校前列。

在我的推荐下，他开始出任校学生会卫生部部长，并成立了卫生督查小组，全天进行督查。在他的带动下，学校的卫生工作保持良好态势。

由于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校又让他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这下他更有了用武之地，他先把各部部长组织起来进行培训，明确各自职责，制定具体可行的办法，然后放手工作。

“小灵通”变成了“小神通”。没想到，一次误打误撞的约定，竟然给他搭建了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而这时，我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如果当初我与他约定的初衷源于相信，虽然结果相同，但是我相信，会出现更多的“小神通”。

但愿以后，我不会再错过更多的“小神通”。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童心绘师

老师，是您教我们知识，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老师，您辛苦了！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小学 四(7)班 刘拟 指导教师 牵晶莹

且行且思

□王 君

众“生”皆可“度”

教师这个职业，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只有“己”这个生命有足够的好，才有可能让另一个生命也产生良性的变化。所以，要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必须先度己。

一个朋友疑惑地问：“我可以努力修炼自己，可是，是否有根本不可度之众生？”

我想了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众生皆可度。”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对许多学生无能为力呢？

说学生不可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先有了一个“度”的标准。我们的思维方式、心智系统使我们头脑中对优秀学生的定义是相对固定的，于是我们的潜意识就把学生往这样的方向去“度”。

结果是什么？

有学生买账，有学生不买账。于是我们常常抱怨，现在这些“熊孩子”，根本不可教。

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确实不都是孩子的错。

举些极端的例子：像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人物，如果是我们的学生，是不是也会被我们认为是不可“度”呢？

什么是“度”？“度”不是要把学生变成我们心灵版权上的那个样子，而是帮助他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教育不再是塑造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是可“度”的。向善、向美、向真是人与生俱来的渴望。你不相信，就看不到。

此外，我们说学生不可度，可能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

我们与一个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根本无法用孩子现在某些优秀或不优秀的表现，去判断他的未来。

今年寒假，我约见了早年在綦江中学的第一批学生。这些孩子现在已35岁左右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成长为了“不一样”的自己。当年沉默内向的，现在是公司主管；当年有几个极为乖巧有魄力的小女生，现在却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许多时候，我们走不出校园，就觉得孩子也“停止”生长了。这是从长远来看。其实就在当下，学生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在进步的。这样的变化，更需要教师的慧心才可能发现。许多教师，连对自己都失望。他们用这样的眼光看世界，必然对谁都失望。

回顾自己20多年的教学生涯，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个学生不可“度”。如今，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生。他们在自己的生命轨道上前行，对这个世界都有贡献，都有感悟。有成就大小、悟道深浅之分，但没有高下尊卑之分。生命，只要在路上，确实就是风景，也确实就能看到风景。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读书时间

□杨林柯

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

这是我的一本随笔集，也是一本真话录。大部分是发表过的，也有未曾发表的，还有一些是我日常生活中断断续续写在随笔本上只给自己看的。

我觉得，在一个泛出书的时代，各种图书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书的质量似乎很难让人满意。因此出书似乎无多少意义。

书不在多，而在精。虽然我此前已出版过几十本书，这些书，有文化类的，有名著普及类的，也有一些中学阅读教材和教辅类书籍，但在我心目中，这些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书。我觉得，真正的书应该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有个体的思想跋涉，有对人类的安慰，有对人类的关怀，有对大道的追索。这样的书，我这一生恐怕是写不出来了。但退休前，我想至少写一本对得起读者的书，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2012年，我写给家长与学生的“万言信”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共鸣。而正是这些关注让我改变了想法——真话还是有力量的！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大语文”的教学观，凡母语能够承载的内容都可以进入课堂。

在教学中，我尝试跨越工具化的语文框架，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大事情，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我觉得，独立思考能力关乎人的幸福；一个人越善于独立思考，越不会被压力击倒，也越会找到自信与快乐。但在僵化的评价体系下，我时常充满困惑与矛盾，比如，学生的独立思考经常会受到大一统思维的绞杀；学生的生命状态很难得到教育的温情眷顾；功利主义的肆虐使教育在反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教育本有的价值不断遭到抑制，而教师能够影响到的空间非常有限。

更可怕的是，群体评价不仅绞杀个性价值，甚至不断逼迫良心向现实让步。逆淘汰法则畅行无阻，传道型教师备受冷落，训练工作者如鱼得水。

在关注学业成功又关切身心成长的教育实践中，我不得不两面出击，但常常是两面受困。我深切感到，教育真难，坚守真苦！

面对孩子们厚厚的眼镜片和迷茫的眼神，以及不时听到或看到花季少年猝然离去的消息，我焦虑、苦闷，教育就这样下去吗？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我想守住我的课堂，我希望语文在人文教育方面可以小有作为。

教育对人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有外在的使命担当，也应该有内在的自我成全，它不仅是国家社会的工具，也应该对人有终极关怀，让每一个灵性觉醒，自觉寻找家园。

孩子们的生命属于自己，他们需要体验和品尝各种滋味，而不是天然要首先担当使命，况且，上天赐予每一个人的能力各异，不能把所有的生命都赶往一个胡同。学校不是集中营，生命的发展因为自由意志，而不是因为高高举起的鞭子。压迫者的教育不是教育，而是动物的驯化，它已背离生命自身的逻辑。一个人的生命不能由别人说了算，外在灌输得再好也要通过自我的内化，只有走向自我的教育才是人性的教育。人口众多也不是教育落后的借口，为了糊口的教育不是教育。

青春应该是灿烂的，不应该是荒芜的；青春应该是燃烧的，而不应该只在失败与颓废中冒烟。

改变，要从每一个人做起。路在脚下，推动自己，其实就是推动世界，也是推动教育。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本文系作者新书《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自序节选）